

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

——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 「山川」、「山水」論述

鄭毓瑜

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提 要

一般論及中國的山水文學，大抵以「山水詩」為討論重心，本文則希望以謝靈運〈山居賦〉為出發點，透過賦體挪借自於《尚書·禹貢》、《周禮·地官》等傳統地理論述中的山川名物之連類方式，擴大探討所謂山水文學如何參與當時的地理書寫。選擇這個地理書寫的角度重看〈山居賦〉，首先，因此可以理解謝靈運偏愛使用「山川」一詞的原由，正在於「山居」的書寫是奠基於山川名物的類聚模式，方便地挪借了擁有權的象徵性；進一步也可以說謝靈運同時正是在定位自己的書寫並不只是「居處」所有版圖的宣示，而是企圖將〈山居賦〉也納入地理書寫系統的發展中。於是，當謝靈運參與東晉以來興盛的一種透過身體行動的地理發現（窮究歷覽），他同時也改造了原有的名物訓解系統，不論是強調八方殊異的山川形勢，或是由物與物之間的動態關係，來取代原有普遍物性的展示；或是以親歷身觀的體驗空間，取代可以精審

估算的數據圖譜，在中國文學史上被目為「山水詩」大家的謝靈運，其實更是「新地理」論述的營造者之一。最後，從名物連類的角度進行山水文學的研究，也許更能在謝靈運的個人才分、玄學思潮與江南環境這些分散的因素之外，提出一個同時可以整合傳統與當代地理論述的核心模式；並且具體呈現，所謂「山川」或「山水」風貌在不同時代的提出，根本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套名物連類系統，舉凡政治權力（出處朝野）的象徵、思想觀念（莊老或佛道）的隱喻或是文學美感（巧構形似）的發引，都可以說是在這套已經被熟悉、認可的名物詮解中反覆被敷演與重新建構出來。

關鍵詞：謝靈運 〈山居賦〉 山川 山水 身體行動 地理種類

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

——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 「山川」、「山水」論述

鄭毓瑜

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一、前言：文類與名物

一般論及中國文學史中所謂的「山水詩」，大抵都有一個確切的指涉範圍，就時代來說，是特指東晉以降至於南朝宋齊年間描寫自然風物的詩作；就寫作技巧來說，由於自然景物不再僅是比喻寄託的材料，因此出現描摹具體感知以符應耳目觀覽的「形似」手法；至於此種詩作所呈現的美感經驗，尤其被認為受到老莊玄理的影響，而還給大自然不受人情干擾的本來面目。^❶在這些針對「山水詩」的討論中，明顯先排除了其他有可能進入「山水」文學領域的作品，完全聚焦在「詩」這個文類，以致於一

❶ 此處關於晉宋以來山水詩或巧構形似現象的研究摘要，詳見如林文月：〈中國山水詩的特質〉，收入氏著：《山水與古典》（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23-61；廖蔚卿：〈從文學現象與文學思想的關係談六朝「巧構形似之言」的詩〉，收入氏著：《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7年），頁537-578；王國瓊：《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1986年）第二部份〈中國山水詩的特色〉中第二節〈中國山水詩的物我關係〉，頁391-441。

方面在論及山水詩的書寫源流時，似乎有意與魏晉之前包括《詩經》、《離騷》，尤其也「巧為形似之言」^②的漢賦之景物書寫強力區分畫界；另一方面，由於僅局限在山水詩所反映或所影響的晉宋文學或社會文化的發展，因此像是兩漢以後其實也同時存在的山水賦，或是《宜都記》等地志書寫中所透露的面對山水的態度與跨越文類界限的書寫模式，很容易就在「山水」文學的討論中失去該有的地位。

或者應該說，在現有中國文學史的論著中，已經有一套閱讀「山水詩」的方法，但是尚未有一種更全面的看待「山水文學（或山水書寫）」的方法。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謝靈運研究了。一般認為謝靈運是中國山水詩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但是被顧紹柏認為「稱得上是一篇山水賦」^③的〈山居賦〉就沒有獲得研究者同樣的重視。顧紹柏說到「在靈運以前，還不曾有過這種以山水為主要表現對象的洋洋大賦」，並且認為它比較真實，提供許多當時地形、出產的資料，尤其配合謝靈運的《遊名山志》來看，這些類似地理方志的作品，為後代的地理學家、動植物學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④另外有一種看待〈山居賦〉的方式，是認為這種「居」（相對於「公的世界」的「私的場域」）的主題，是山水、隱逸文學的核心，如日本學者齋藤希史在〈「居」の文學——六朝山水／隱逸文學への一視座〉文中，就提到謝靈運的〈山居賦〉，「描述規模壯大的、被山水圍繞的『居』，可說是與『國家的秩序』相對的、歌頌『私的秩序』之文學宣言」，而包括歌詠家族生活經營或與友人的宴遊之樂，皆是「私的秩序」的重要組成元素。^⑤

這兩種對於〈山居賦〉的看法，明顯都有助於開闊現有圈限於山水詩所提出的形似技巧或美感經驗的討論，比如可以從詩歌句式、對偶的研究也注意到散體大賦的引

② 沈約：《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4年）卷67〈謝靈運〉傳「史臣」曰：「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頁1778。

③ 參見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前言〉，頁16。

④ 同前註。

⑤ 參見齋藤希史在〈「居」の文學——六朝山水／隱逸文學への一視座〉，《中國文學報》（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研究室，1990年10月）42卷，頁61-92，此處關於〈山居賦〉的說法，見頁86-87。

證、描述功能，甚至是謝靈運自注的作用；而不論山川方物或居處經營，若成為討論山水文學時不應被排除的相關類項，那麼當然也可以擴大美感經驗的詮釋基礎，而不必然只是玄遠的老莊之道。更進一步來說，顧紹柏與齋藤希史也都注意到〈山居賦〉雖然承襲漢大賦壯盛廣包的風格，但是已不能視作為「國家秩序」的宣言，^⑥如同〈山居賦〉序所言：

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敘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⑦

顯然這其中牽涉的不只是文類格式的問題，還是因為聯繫了哪些經過選擇的相關事物的類別，以致於顯現不同狀態的「山水」、或（〈山居賦〉中常用的）「山川」，而產生不同的連類效應的問題。所以匯聚「京都、宮觀、遊獵、聲色」與聚合「山野、草木、水石、穀稼」兩組事物，一旦經過相應和的連結或組合模式，就構成了兩種不同的處身場域；像謝靈運在賦文開頭就分辨的「徒形域之蒼蔚，惜事異於栖盤」、「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遁之所由」，亦即所謂在「朝」與否的情境表現，可能就出乎一個適切的類聚場合中。

換言之，從「觀覽」山水到「書寫」山水，這當中存在一套歷經風物的分類、連繫乃至於產生意義或趣味的過程，如果要更全面的理解中國在東晉以降對於自然風物的新體驗，可能必須探索其中原有的與新出的連類方式，以及不同時期的文人對於某些類別的偏好，及其所設想的連類意趣。以謝靈運來說，被後人認為是「山水」詩大家，但〈山居賦〉中卻明顯好用「山川」一詞，因此本文的討論將首先針對魏晉的史傳資料在「山川」與「山水」這兩個詞語的用法上，作初步釐析；其次，分析〈山居賦〉如何挪借漢代以來的「山川」名物說解，卻同時能交織東晉以降「山水」經處的趣味，並提出一個基於身體行動所建構的新的山川關係；最後，更透過對於晉宋間私

^⑥ 所謂「國家秩序」乃齋藤希史之言，同前註。本文希望藉助地理論述的根本——名物類聚的書寫模式，對於齋藤希史所謂呼應國家或私人秩序的居處規模能有更深層的分析。

^⑦ 謝靈運〈山居賦〉全文，引自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頁449-465。下文不再加註。

人地記書寫的考察，嘗試將〈山居賦〉放在當時這一個建構新「種類」地理（地方）的潮流中看待，希望藉此透露「山水」文學的發展其實是有效地轉化了「山川」類聚的模式。

本文從名物類聚的角度進行討論，希望可以開放山水書寫比較廣闊的研究視野，在形似技巧、玄遠美感之外，也從名物知識與連類方式上，提出更多補充；那麼也許可以發現，從「山川」到「山水」這看起來不同的關係場域，其實在整個中國地理論述傳統中一直有著不曾間斷的傳移與轉化。

二、「山川」與「山水」：帝國與世族的地理論述

從文學史所得到的印象，謝靈運被定位為「山水」詩人，但如果翻查謝靈運所有詩文，就會發現其中被使用的最多的反倒是「山川」一詞，^⑧尤其〈山居賦〉裡，除了出現一次「山水」之外，其餘是十三次「山川」（另有一次「山林」）。這不禁令人好奇謝靈運鍾情「山川」一詞的意圖，同時也有必要從魏晉史籍的記載，來考察當時這兩個詞語的用法。

（一）「山川」論述：識別名物與地理政治

從《三國志》的記載（包含附注）來說，屬於「山川」含意的用法最常出現，「山水」則往往用如「山川」。比如，這樣談到「山川」：

（臧）旻有幹事才，達於從政，……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

⑧ 在謝靈運詩文中，「山水」出現四次，「山川」十六次，「山林」二次，顯然以「山川」用法為主。

何以加此」？^⑨

（鮮卑）檀石槐既立，……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周羅山川、水澤、鹽池甚廣。漢患之，桓帝時使匈奴中郎將張奐征之，不克。

^⑩

（劉）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眾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⑪

這裡的「山川」如同「草木」、「鳥獸」、「鹽池」，都是指稱土地上的所有物，同時與其他伴隨土地而來的人口、風俗等，共同構成地域上的差異（西域、鮮卑、益州），進而成為不同國族所據有的資源或國力指標。所以會出現像「割據山川」，^⑫「憑恃山川」，^⑬或者具有「山川之險」、「山川之固」^⑭這等易守難攻、甚而可以與天下爭衡的形勢。而從描述吳、蜀兩國常用到「依阻山水」或「憑阻山水」^⑮來看，此處

-
- ^⑨ 出自《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卷7《魏書》〈臧洪〉傳述及「父曼，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裴松之注引謝承《後漢書》，頁231。
- ^⑩ 出自《三國志》（同前註）卷30《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注所引王沈《魏書》，頁837。
- ^⑪ 出自《三國志》（同前註）卷32《蜀書》〈先主〉傳，裴注所引韋昭《吳書》，頁881。
- ^⑫ 出自《三國志》（同前註）卷48《吳書》〈三嗣主〉傳，裴注引陸機〈辨亡論〉所云：「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頁1180。
- ^⑬ 出自《三國志》（同前註）卷13《魏書》〈華歆〉傳，記載太和中帝遣曹真伐蜀，華歆上書諫「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帝報曰：「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頁405。
- ^⑭ 如《三國志》（同前註）卷6《魏書》〈董二袁劉〉傳末尾述及劉琮降操，受封列侯，裴注引《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彊，與秦爭衡，荊州則其故地」，頁215；《三國志》（同前註）卷48《吳書》〈三嗣主〉傳，裴注引陸機〈辨亡論〉所云：「山川之險易守也」，頁1182；《三國志》（同前註）卷55《吳書》〈程黃韓蔣……等〉傳，董襲答孫權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頁1291。
- ^⑮ 如《三國志》（同前註）卷10《魏書》〈荀彧荀攸賈詡〉傳，記載賈詡之言：「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頁331；又《三國志》卷12《魏書》〈崔毛徐何等〉傳，鮑勛諫止文帝征吳，曰：「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頁385。

之「山水」，其實義同「山川」。如此，「山川」是地理實物，同時也被割據或佔有而成為政治權限的象徵；乃至於軍政災異也必須祭祀山川，祝告山川之神靈。比如：

（孫權與蜀結盟）造為盟曰：「……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有逾此盟，……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¹⁶

青龍元年……閏（五）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諸王女皆為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¹⁷

祝告山川神靈在傳統政治體制中，其實早有一套講究身分、場合、獻祭、時節的規矩，如《尚書》中記載舜繼位之後，祭祀了上帝、天地四時，並「望于山川，徧于群神」，孔傳認為這「山川」是指「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¹⁸又禹治理九州之土，且「奠高山大川」，孔傳說這是訂定高山五岳、大川四瀆之差等次序，以為祀禮之依據。¹⁹就如同《禮記》〈王制〉篇所謂「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²⁰而〈月令〉篇也記載孟春時「命祀山林川澤」，²¹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²²如此看來，「山川」論述顯然有其理地治國的背景，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地理論述的一部份。

這種地理政治學，使「山川」如同原隰、丘陵、池澤等，都必須經過準確地勘查、區辨、定秩，而成為國族版圖上分疆畫界、品物教民的一個重要環節。《晉書》記載裴秀製作〈禹貢地域圖〉可以說就是這個傳統下的產物。裴秀一方面認為古來圖籍必須重新考注，如「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早已不合事實，一方面強調圖籍精準的重要，如司馬昭曾命人撰訪吳蜀地圖，平蜀之後，「六軍所經，地域遠

¹⁶ 引自《三國志》（同前註）卷47《吳書》〈吳主〉傳，頁1135。

¹⁷ 引自《三國志》（同前註）卷3《魏書》〈明帝紀〉，頁99。

¹⁸ 引自《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十三經注疏本）卷3〈舜典〉，頁36。

¹⁹ 引自《尚書正義》（同前註）卷6〈禹貢〉，頁77。

²⁰ 引自《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十三經注疏本）卷12〈王制〉，頁242。

²¹ 引自《禮記正義》（同前註）卷14〈月令〉，頁289。

²² 引自《禮記正義》（同前註）卷14〈月令〉，頁347。

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較驗圖記，罔或有差」。所以他提出製圖六體：包括「分率（廣輪之度）」（即面積）、「準望」（即方位）、「道里」（遠近）、「高下（逢高取下）」、「方邪（方則取斜）」、「迂直（迂則取直）」（後三種為求取水平直線距離的方式）²³，透過這些製圖法，讓山川土地成為可以「依據」的、「精審」之「事實」。²⁴當然，擁有精準的輿圖，就等於掌握天下虛實，進而擁有治理天下的關鍵。這早在《周禮》〈地官·大司徒〉中敘述大司徒的執掌就說得很清楚：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早（阜也）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²⁵

辨其「名物」，是指分辨十等土地之「形狀名號及所出之物」，²⁶如果大別為五類，並依照「地名—動植物類—人民」的聯繫，很容易就能分判差異同時也完整串連起不同類別地域的土俗貢賦；甚而進一步依據這五地的民俗差別，而施行十二種教民之道，比如教民禮敬、謙讓，或教以節制，施以刑罰或頒與爵祿等。顯然，這一套山川的「名物」分辨，不僅僅在於呈現有無、區判彼此，就在「識別（名物）」的同時，也蘊藏了對於土物經濟、人民行動的種種認定與掌控。

如果識別與掌控根本就是一體的兩面，對於強調實證的山川品物之論述，也就有必要仔細檢驗。比如西晉左思作〈三都賦〉，先批評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等託假果樹珍怪以為誇飾，而自序所作〈三都〉則：

²³ 關於後三種製圖方式的解說可參陳曉中：《中國古代的科技》（臺北：明文書局，1981年），頁293。

²⁴ 見《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35〈裴秀〉傳，關於作〈禹貢地域圖〉的描述，出自頁1039-1040，其序文談到當時所見地圖「雖有粗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

²⁵ 引自《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十三經注疏本）卷10，〈地官·大司徒〉，頁149-150。

²⁶ 見〈地官·大司徒〉「辨其……名物」下之孔疏，同前註，頁149。

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慎，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詁訓焉。²⁷

左思自己其實也不乏虛誇，²⁸因此所謂考較地圖、方志或舊俗，毋寧可以視作是一種刻意的宣告——大賦的書寫本來就應該屬於如同〈禹貢〉以來的山川名物論述。所以虛誇與否，顯然是程度或熟練度的問題，但是都沒有離開這個名物辨識的傳統。像皇甫謐的〈三都賦序〉，雖然也從名物虛實的角度批評漢大賦，認為「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不應引他方之物，為中原所有；但是也推崇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等人的賦作，「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能夠適當地調節宏侈與約簡，仍然是辭賦之偉作。²⁹換言之，大賦不但可以視作是挪借了山川名物模式，甚而就如同這套論述，妥貼而平衡的書寫就直接具有理地治國的效力。

皇甫謐提到〈三都賦〉裡，以吳、蜀為客，以魏為主，並且就在各自的地域描述中，呈現出魏國承襲唐虞的合法性，因為：

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眾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

正（政）統如果從所據州國、物產、土俗、人物來加以校量，顯然掌握愈豐富的山川名物知識，就愈能掌握住權力；君王權力的合法性因此不必然訴諸道德規範或法令制度，而是直接存在一套名物說解系統中。這因此可以解釋「巨麗」的漢大賦如此迎合帝王心意的原由。當司馬相如透過子虛、烏有先生以及亡是公三人對於齊、楚藩國與帝王苑囿進行描述，不但順勢批評了齊、楚的誇炫土物、越界行獵，乃是忽失君臣之

²⁷ 引自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卷4，頁82。

²⁸ 如錢鍾書曾引李治《敬齋古今叢》的說法，舉出如〈吳都〉「巨鰲」、「大鵬」、〈蜀都〉之「感鰓魚，動陽侯」等，亦莫不詭激誇大，見《管錐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01年）第三冊，頁511-512。

²⁹ 皇甫謐：〈三都賦序〉，見李善注《昭明文選》卷45，頁1002-1003。

間上下有別、施受有分（天下本為君王所有）的禮義；更直接以類似知識百科的手法，類聚了上林苑中的山川、草木、禽魚、宮觀、遊獵種種，巧妙展示出坐擁天下萬物的帝王威望。³⁰這說明了一旦進入這套名物知識系統，理解或描述的不只是有憑據、可校驗的土地人物，還是無形中擁有了一種定名萬有、宣示世界秩序的權力。而枚乘在〈七發〉中所謂：

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³¹

更揭示了大賦作者諷誦山川名物，如何令君王滿足臥遊寰宇的欲望；就在考訂山川的源流至到，包羅草木鳥獸且類分定名的過程中，這種極端知識性、實證性的大賦論述模式，有效地保證了無可質疑的、甚至獲得尊崇的權力地位。

（二）「山水」論述：窮究歷覽與山澤經營

如果比較《三國志》與《晉書》中關於「山川」、「山水」這兩個詞語的使用次數，會發現《晉書》傳記中突然大量增加「山水」的使用，而且不像《三國志》中的「山水」往往用如「山川」（如「依阻山水」），反倒是「山川」可以用如「山水」，像「山川之美」即「山水之美」。首先，是關於「登臨山水」的例子，如史傳載阮籍「登臨山水，經日忘歸」，³²或如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³³這裡雖然提到「山水」，但往往是借山水詠懷，如羊祜登臨遠望後，慨嘆峴山久遠，而登臨者卻湮沒無聞，重點並非在山水本身。如果相較於孫統的例子，這差異會更清楚：

（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褚裒聞其名，命為參軍，

³⁰ 關於司馬相如〈天子遊獵賦〉如何在地理論述中發揮權力宰制的效應，請詳見鄭毓瑜：〈歸反的回音——地理論述與家國想像〉第二節「體國經野：苑囿與行旅的交叉變奏」，收入氏著：《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尤見頁85-90。

³¹ 此段〈七發〉文字引自李善注：《昭明文選》卷34，頁751。

³² 見《晉書》（同註²⁴）卷49〈阮籍〉傳，頁1359。

³³ 見《晉書》（同註²⁴）卷34〈羊祜〉傳，頁1020。

辭不就，家于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為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為餘姚令，卒。³⁴

所謂「靡不窮究」，顯然有不同於登臨感懷的周遊歷覽、探勘驗證的意味，尤其孫統求為「鄞」令，後為餘姚令，「鄞」與「餘姚」即便是到了劉宋時期，都仍然是朝中建議徙民以開墾的荒僻之地，³⁵因此孫統的「窮究」山水是否如劉尹所稱只是「賞翫」而已，³⁶值得推敲。

在「山水」一詞的相關用法中，偏重游賞山水的記載的確可以說是最為常見的，如以下孫綽、王羲之、謝安等事例：

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³⁷

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遍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³⁸

（謝安）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

³⁴ 《晉書》（同註²⁴）卷 56〈孫統〉傳，頁 1543。

³⁵ 《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4 年）卷 54〈孔季恭附弟靈符〉傳，記載靈符為丹陽尹，以「山陰縣土境褊狹，民多田少」，因此「表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鄮三縣界，墾起湖田」，朝中公卿雖然多持保留態度，但世祖最後「從其徙民，並成良業」，頁 1533。唐長孺曾引此則史料以說明當時同屬會稽的濱海諸縣仍有空荒的未墾湖田，見〈南朝的屯、邸、別墅及山澤佔領〉，《歷史研究》（北京：中國科學院）1954 年第 3 期，頁 95-113。

³⁶ 《世說新語》〈任誕〉第 36 則記載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卻返」，引自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4 年），頁 750。

³⁷ 引自《晉書》（同註²⁴）卷 56〈孫綽〉傳，頁 1544。

³⁸ 引自《晉書》（同註²⁴）卷 80〈王羲之〉傳，頁 2098-2101。

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去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眾咸服其雅量。³⁹

以上資料，似乎就是呈現謝安、王羲之、孫綽三人遊山玩水的生活狀況，弋釣、採藥、泛海、吟嘯、言詠屬文等活動共同聯繫成所謂「山水之遊」的型態，顯然與前一小節治領九州的「山川」論述大異其趣。不過，如果注意到他們都寓居於會稽，那麼，這個「山水之遊」似乎就不能單單視為一般的栖遲隱逸，而非關於地利資產。孫綽曾作〈遂初賦〉，自言「慕老莊之道」，因此：

（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⁴⁰

孫綽所築雖然簡約，不過，在會稽經營居處，卻是當時北來的世家大族極力爭取與關注的目標。如前所引，王羲之、謝安等窮名山、泛滄海，看似時興的山水之游，但是王羲之曾經與謝萬書曰：

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⁴¹

所謂「行田視地利」就如同「行鄉里視宮室」或「入山行木」，⁴²這些原本屬於朝廷政務，在這裡顯然轉而成為世族經營山野的基本事務。根據唐長孺的研究，東晉南遷的大族到江南以後，當時三吳地區的耕地已大部分集中在南方大族手中，於是只好往

³⁹ 引自《晉書》（同註²⁴）卷79〈謝安〉傳，頁2072。

⁴⁰ 見《世說新語》〈語言〉篇第84則劉孝標注所引〈遂初賦〉序文，引自《世說新語箋疏》，頁140。

⁴¹ 引自《晉書》（同註²⁴）卷80〈王羲之〉傳，頁2102。

⁴² 分別參見《管子》〈立政〉第四，引自《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2004年），頁73，以及《呂氏春秋》〈季夏紀〉，引自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臺北：華正書局，1988年），頁312。

未開墾或較貧瘠的地區去尋求土地，比如姑熟、吳興或會稽；而會稽郡城山陰已被當地豪族所佔領，所以只好往會稽沿海諸縣去尋求。王羲之這封書信中所提及的「東游」即指游會稽，而「游山海」結合起「行田、視地利」，可見絕不只是頤養閒暇或無事優游。⁴³

「山水之游」既然有可能基於封佔山澤的現實慾望，顯然就無法完全由所謂「高尚之志」、「無處世意」來詮釋這些「棲遲東土」、「弋釣為娛」的行為；換言之，愛好山水並不全等於絕俗隱逸。前述王羲之與謝萬書說到，東游山海其實結合視察地利，同時也提到：「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⁴⁴據考察，王羲之至少在烏澤、吳興與會稽三處都有田產，其間如何努力爭取乃至於巡視、經營，而致可以衣食無虞、游觀歡譚，這恐怕不是單純游賞可以比擬。⁴⁵同樣的，謝安也曾在京城附近的土山營建別墅，「樓館竹林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⁴⁶這也許可以說明類似謝安這等世家子弟的游賞宴集，往往不能忽略作為基礎的經濟因素。謝安的孫子謝混，很少與人交接，「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也就是所謂「烏衣之遊」，據史書記載，謝安與其子謝琰所累積的資產極為可觀，到了謝混時，已經是「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即便是謝混死後，在謝弘微經營下，田疇墾闢，更甚於前。謝混的妻子東鄉君死的時候：

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⁴⁷

⁴³ 詳見唐長孺：〈南朝的屯、邸、別墅及山澤佔領〉，尤見頁108-110。

⁴⁴ 引自《晉書》（同註²⁴）卷80〈王羲之〉傳，頁2102。

⁴⁵ 唐長孺曾引《法書要錄》卷10所輯王羲之與王恬（王導之子）書所謂「一頃烏澤田，二頃吳興，想弟可還以與吾」，並與謝萬書所謂「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認為王羲之至少在烏澤、吳興、會稽三處有田，參見《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的發展》（臺北：帛書出版社，未著出版年）〈四、東晉南朝的豪門地主〉，頁59。

⁴⁶ 引自《晉書》（同註²⁴）卷79〈謝安〉傳，頁2075-2076。

⁴⁷ 以上關於謝混、謝弘微事，見《宋書》卷58〈謝弘微〉傳，頁1591-1593。

由此當然可見謝弘微的謹慎無私，但同時也可見世家子弟並不必然只是泛遊山水、弋釣言詠而已，經營家族產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才能。

謝氏家族除了謝安這一支系饒富資產之外，謝靈運這支系自祖父謝玄以來，也在會稽始寧有故宅及別墅。在《宋書》謝靈運本傳中，最為人所注意的記載，往往是關於謝靈運如何愛好山水，肆意游娛的描述，如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歷諸縣」，或稱疾去職回到始寧墅後，「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為娛，有終焉之志」⁴⁸。但是有一段記載也許應該比合而觀：

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以為山賊，……在會稽亦多徒眾，驚動縣邑。⁴⁹

如果注意到「尋山陟嶺，必造幽峻」是上承「鑿山浚湖，功役無已」，下啟「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就清楚知道謝靈運的登陟活動所以從者眾多，正是為了山澤的開發，而如此的尋幽訪勝當然也不能輕易排除經濟目的的考量。因此像是謝靈運兩次請求開決會稽的回踵湖與始寧的岬嶂湖，以做為耕田，唐長孺先生就認為這足以說明謝靈運在遊山玩水時也不會放過尚未開墾的山野湖泊。⁵⁰換言之，探尋山水之美與封佔山澤之利，很可能是出自同一種慾望，賞翫宴集、弋釣泛遊是可以與經營山野園宅的舉動不相衝突的聯繫起來，山野園宅可以透過經營開發而具有栖逸的品味。那麼，一套現成的考究「地方—物類」的「山川」論述，當然很可能就隱伏成為這些世族在遊賞山水時最熟悉而初步的辨識模式；同時，與遊賞相結合的考察、經營當然也很可能反過來作用於原有的名物訓解模式，而改造名物類聚所構成的山川（或山水）

⁴⁸ 《宋書》（同註³⁵）卷 67〈謝靈運〉傳，頁 1753、1754。

⁴⁹ 引自《宋書》（同註³⁵）卷 67〈謝靈運〉傳，頁 1775。

⁵⁰ 關於謝靈運求決回踵湖與岬嶂湖，見《宋書》（同註³⁵）卷 67〈謝靈運〉傳，頁 1776；唐長孺針對這則史料的說法，見《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的发展》〈四、東晉南朝的豪門地主〉，頁 65。

風貌。

三、〈山居賦〉：身體行動與山川關係

透過以上關於「山川」與「山水」兩個詞語在魏晉以來的用法分析，可見，山川名物不能僅僅視作實證知識，而忽略背後所隱含的權力、慾望；而山水游賞也不必全然就是絕俗隱逸，很可能與世族的政治經濟勢力有關。從這樣的用詞背景，也許可以重新考察謝靈運〈山居賦〉所以偏愛使用「山川」一詞來建構家族「山水」體驗的原由：可以說是挪借了「辨其名物」的知識權威轉注為南朝世家大族佔領山澤名物的合法性；當然，觀覽窮究所獲得的實地體驗，也可能轉化名物辨識或聯繫的模式，而推究出新的「山川」關係。〈山居賦〉這個合法性的形成，與謝靈運選取大賦體式有絕對關係。因為選擇了體式，也就選擇了這個體式所規範的意義，所以謝靈運一開始對於構成大賦的核心因素——名物類別就非常講究，可以說是反覆地分辨與彰明自己這篇〈山居賦〉會因為名物體系的差別，而造就不同於以往的聯繫效應。

（一）「經始山川」——八方殊異的山川關係

在〈山居賦〉序文中首先標明，將以「山野、草木、水石、穀稼」取代「京都、宮觀、遊獵、聲色」，這是基於所取材的方域（山野相對於京都），判分出兩個不同的名物體系；並且在這兩個端點之間又細分出四個不同的居處地點：岩栖、山居、丘園、城傍，而在賦文起始，先是排除有風露之患的巢居穴處，接著按次第列舉如二家山居（仲長統、應璩）、二地珍麗（卓王孫與石崇相應於丘園的山川製作）以及諸王侯宮苑以為例。謝靈運針對後三者的看法分別是：

昔仲長願言，流水高山；應璩作書，邛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周員。

銅陵之奧，……金谷之麗，……徒形域之蒼蔚，惜事異於栖盤。

至若鳳、叢二臺，雲夢、青丘、……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遁之所遊。且山川之

未備，亦何議於兼求。⁵¹

在這些看法中，可以歸納出謝靈運對於所謂「山居」的兩個要求：其一，山居必須適於栖盤嘉遁，為「幽人憩止之鄉」（謝靈運自注），尤其批評銅陵、金谷二地雖珍麗，「然製作非栖盤之意也」（自注），顯然如何的「製作（者）」是決定關鍵，而不只是懷抱莊老思想；其二，雖然有別於「形域之薈蔚」、「千乘之珍苑」，但是地勢周員、「山川兼茂」（自注），仍是謝靈運對於居處的基本要求，所以仲長統、應璩二家雖然也提出山居的理想，卻「不得周員之美」（自注）。這兩點，其實也正照應了〈山居賦〉中「山川」一詞最主要的兩個用意，前者如：

故選神麗之所，以申高棲之意。經始山川，實基於此。（自注）

謝平生於知遊，棲清曠於山川。（自注：曰與知遊別，故曰謝平生；就山川，故曰棲清曠。）

後者則有如：

且山川之未備，亦何議於兼求。（自注：且山川亦不能兼茂，隨地勢所遇耳。）

植物既載，動類亦繁，飛泳騁透，胡可根源，觀貌相音，備列山川。（自注：謂種類既繁，不可根源，但觀其貌狀，相其音聲，則知山川之好）

卓王孫採山鑄銅，故《漢書·貨殖》傳云：「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自注）

金谷，石季倫之別廬，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自注）

上田在下湖之水口，名為田口。下湖在田之下下處，並有名山川。（自注）

近南則會以雙流，縈以三洲。表裡回游，離合山川。

⁵¹ 引自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同註⁹），頁450。

山川澗石，洲岸草木，既標異於前章，亦列同於後牘。（自注：此章謂山川眾美，亦不必有，故總敘其最。）

在後一部份的資料裡，山川不但與林木、池沼、澗石等，成為可以計數、觀察、齊備、擁有的「山川眾美」、「山川之好」，同時也呈現與不同地點相結合的多樣山形水勢與特殊物產，這無疑暗示了謝靈運希企也擁有足與宮苑聲色相比擬的山野名物組合。而賦文中唯一一次出現的「山水」，在「因以小湖」一段，以「別有山水，路邈緬歸」，描述眾山泉流聚小湖，各有形勢，此一「山水」或用指山泉形勢，亦可屬於「山川」用法。前一部份的資料則特別標出「清曠」作為「經始」山川的標的，一方面這是出自於仲長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的說法，⁵²另一方面也正是謝靈運在〈過始寧墅〉中所謂「淄磷謝清曠」的愧悔，或是〈遊名山志〉序文所謂「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耶」⁵³的認定，並與其他如「山水含清暉」、「懷抱既昭曠」、「江山共開曠」等「清暉」、「昭曠」、「開曠」的用法相呼應，都是強調一己懷抱與山川方域共此清朗曠遠。⁵⁴「備列山川」的要求，促使〈山居賦〉採用如漢大賦一般完備的名物類聚作為論述的基礎，而「山川清曠」，則要求透過實際的創建經營（不是絕俗棄世），讓山野名物流露相對於廟堂的清曠意味。顯然，若欲談論謝家的「漁弋山水」（謝安傳）、「肆意游遨」（謝靈運傳），根本不能忽略〈山居賦〉裡這一套結合名物辨識與經營視野的新論述。

〈山居賦〉「覽明達之撫運，乘機緘而理默」一段，提及謝玄功成身退，高棲自然，「經始山川，實基於此」（自注），換言之，「高棲之意得」，是因為選擇了「神麗」之所，如何由「備列」名物到棲止「清曠」，必須由實地的所見、所居談起，這

⁵² 參《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卷49〈仲長統〉傳，頁1644。

⁵³ 引自《謝靈運集校注》（同註³），頁390。

⁵⁴ 〈過始寧墅〉參見《謝靈運集校注》（同註³），頁63；另外如〈石壁精舍還湖中作〉「山水含清暉」，頁165；〈富春渚〉「懷抱既昭曠」，頁69；「江山共開曠」出自〈初往新安至桐廬口〉，頁73；〈山居賦〉亦有「山野昭曠」的用法，頁458。

也是一般由玄思佛道談論謝靈運的隱居始寧最容易忽略的部份。⁵⁵本文因此不在於討論謝靈運到底擁有佛家或道家思想，而重在呈現構顯這些思想意趣的一套風物觀看與論述模式。如果與漢大賦的「體國經野」相比較，謝玄家族的「經始山川」就特別強調探勘選擇所經驗的八方殊異，而不是奄有四海的普遍性的陳述；這其中，實際關連於這地點的山川關係變得特別重要。司馬相如〈上林賦〉開頭描寫上林苑所在是：

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鄠鎬潦潏，紆餘逶迤，經營乎其內。⁵⁶

早有學者指出上林苑的四方界限並非實指，蒼梧其實在上林之南，不得言左（東方），西極若指周太王所居之邠，與流經京畿或上林苑北邊的丹水、紫淵顯然又相去太遠；⁵⁷那麼蒼梧、西極等既非實指的地點，與灞滻涇渭等八川所以紆餘周旋的樣態就沒有必然關係。換言之，地點與其山川形勢缺乏緊密的聯繫，於是以下所鋪敘之川流聲勢、山陵形勢乃至於鳥獸、草木等，就彷如匯聚了關於山、川、鳥、獸、草、木的稱名的所有解釋，並不是特定地點的所有物。這種統括性的解釋，最適於證驗有無，卻顯然弱於勾聯彼此的關係。對照〈山居賦〉在「其居也」以下，總說山居的所在是：

左湖右江，往渚還汀。面山背阜，東阻西傾。抱含吸吐，款跨紆縈。綿聯邪互，側直齊平。

謝靈運在自注中這樣分析自己的寫法，「往渚還汀，謂四面有水；面山背阜，亦謂東

⁵⁵ 比如蕭馳在《佛法與詩境》（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一章〈大乘佛教的受容與晉宋山水文學〉中認為〈山居賦〉所謂「清曠」即「清靜和恢廓曠蕩，正是大乘佛經所描寫諸佛國土不同凡塵的特徵」，並認為謝靈運因此偏愛描寫宵冥迴深的山林，就是「《山居賦》所推崇的“岩栖”者的蠻荒世界」，分見頁20、57-59。但是若注意到〈山居賦〉中反覆提及的「經始」、「開創卜居」、「經略」等，再加上「山水之遊」在當時與巡視地利的相互結合，似乎很難僅僅由佛道思想來解釋〈山居賦〉或當時的山水文學。

⁵⁶ 此處〈上林賦〉引自金國永：《司馬相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32。

⁵⁷ 參見金國永針對「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數句的注釋，《司馬相如集校注》（同前註）頁33，注8。

西有山；……抱含吸吐，謂中央復有川」，其中「四面有水」、「東西有山」、「中央復有川」就像是覆按有無，但是謝靈運的賦文並不止於如此解釋，所以，往還、面背與吸吐，是進一步呈現了由外圍的諸水交錯，到山阜相對的地形起伏（傾、阻），以致於所居中央又懷抱川流的逐層關係狀態。

這樣的山川關係，尤其相應於各個不同的地點，所以〈山居賦〉中細分為八方（缺「遠西」）來描述。這當然不能排除是受到漢大賦巡行四方的遊觀方式的影響，但是像〈上林賦〉所描寫的四方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北則盛夏寒凍裂地……」，這可能包含神話中日出的湯谷（東沼），以及極北的永凍土與極南的不凋之地，充滿神祕誇誕的色彩。〈山居賦〉則力求親身經歷，完全不同於虛設泛論。首先如「近東」部份，描述其景色為：

決飛泉於百仞，森高薄於千麓。寫長源於遠江，派身崑於近瀆。

前兩句寫其高，依據自注，是因為「石滂」縣境與西溪交會處，連綿九里皆是峻崖峭壁，溪水自上而下，故言「飛泉百仞」，另外到外溪十數里，左右岩壁皆綠竹，所以說綠意「高薄千麓」。後兩句敘其遠，則因為西溪水出自始寧附近最高的西谷障，流涇「石滂」到「閔硯」、「黃竹」，一路逶迤，下注良田，所以說有此「長源遠江」。其餘如近南有雙流三洲相互離合，近西有高四十丈之赤壁，照澗映紅，近北以大小巫湖著稱，遠東有仿如神仙所居的重山奇地，遠南則洲浦深沈，遠北與大海相接，曠遠遼闊。以上正是掌握各不相同的土地形貌，因而能呈現足以充分辨識的景觀，而不止於知識百科式的引證陳述；連帶地，針對物產，如所謂「此境出藥甚多」、「東南會稽之竹箭，唯此地最富焉」（皆注文），也都是當地的特色。

於是，這裡的名物辨識不但不同於漢大賦的虛想誇誕，同時也不全同於左思的「稽之地圖、驗之方志」，在圖籍資料之外，謝靈運是用親身歷覽，來建構自己的地理辨識與山川書寫。比如近北、近西兩處注文說到：

常石巖低而水曲，⁵⁸故曰山下而回澤。裏智漫石數里，水從上過，故曰瀨石上而開道。

山高月隱，便謂為陰；鳥集柯鳴，便謂為風也。

首則資料是解說賦文中「山巖下而回澤，瀨石上而開道」兩句，包括常石山旁的岩塊（巖）入水所形成的曲折回流；以及里智溪中佈滿砂石，所以水從石上漫流數里的景象。這山巖回澤、瀨石開道並非歷史故跡或普遍地理知識，而是常石山、里智溪特有的景觀，也只有親臨的謝靈運才能作如此的觀察記錄。第二則資料是關於近西部份的景觀，賦文所謂：「竹緣浦以被綠，石照澗而映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柯以起風」，其中高四十丈的赤色石壁於澗中所形成的紅色倒影，與沿著江岸綿延的綠色竹蔭相互映發，而後兩句又利用月影為山所掩遮、鳥集枝條而鳴聲四起，來傳達觀覽當下無可翻查覆按的視聽感知。如果比較一般關於「陰」、「陽」的訓解，如王逸所謂「陰，曖也；陽，明也」，⁵⁹就可以看出謝靈運在這裡所謂「山高月隱，便謂為陰」，是藉助山的形勢與月的移動之間的相互關係，來傳達陰暗的體驗，而並非解釋一般明暗的概念而已。

換言之，必須透過親身接觸的經驗，才能完成這種不僅止於所有權宣示的山川名物體系，才能讓平行陳列的山川風物因為接觸而拉引出生動的關係意味。比如賦文近南一段提到「崿崩飛於東峭」，自注曰：

崿者謂回江岑，在其山居之南界，有石跳出，將崩江中，行者莫不駭栗。

回江岑一處的山、川關係，因此是透過行者經處（跳出之石傾壓而下，如將崩落江中）的駭栗經驗，才具體勾聯出來。就像遠東部份，談到諸山奇峻，自注曰：「往來要徑石橋，過澗溪，人跡之艱不復過此也」，並不是如〈上林賦〉藉助所謂「隴嵒」、「崔

⁵⁸ 此句原作「常石巖□□□□」，見《謝靈運集校注》（同註⁸）頁453，然顧注53（頁471-472）列有詳細考證，一本作「常石巖低而水曲」。

⁵⁹ 引自王逸：《楚辭章句》（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卷2〈九歌·大司命〉「壹陰兮壹陽，眾莫知兮余所為」句下注釋，頁96。

嵬」、「參差」、「崛崎」等高峻的形容詞彙，⁶⁰而是由經處的艱難直接體現高峻的程度。至於如遠南部份所說：

入極浦而遭回，迷不知所適。上嶽崎而蒙籠，下深沈而澆激。

上、下是縱向俯仰，迷茫不知所往，則是窈窕深入，每一句的首字都強調了人身動作所構劃或體現的空間環境。很明顯，在〈山居賦〉裡，「地名—物類」之間的連繫，是由「接觸」取代了「引證」，進一步可以說，這套新的名物辨識，是身體「實踐」著分類、定名，並組合甚至是開發出新的「山川」風貌。

(二) 寓目美觀：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

〈山居賦〉裡針對經略苦辛與成果的描述，最適合說明謝靈運如何透過身體行動來界定山居的空間特色。如同漢大賦，〈山居賦〉亦類聚居地之物產，但是以「山作水役」一段看來，這些物產的類分、定位與實際採集、製作、應用等密不可分，不只是廣包眾夥地名物訓解。從開頭的「資待各徒，隨節競逐」，就已經說明了各項物資必須依隨季節、日用所需而尋求或開發，比方說「六月採蜜，八月撲栗」，而秋冬就要收藏可以耐饑的藟草；白天拔茅草，晚上搓繩索，這些物資的出現有其次第、目的而並非只是為了鋪陳。同時，尋求所得也與地點、採製手法、生活安排息息相關。比如：

陟嶺刊木，除榛伐竹。抽笋自簞，撻箭於谷。

野有蔓草，獵涉蓂蓂。

慕樾高林，剝芟巖椒。掘蒨陽崖，撻擗陰標。

苦以求成，甘以攪熟。

芟菰翦蒲，以薦以芟。既坭既埏，品收不一。其灰其炭，咸各有律。

⁶⁰ 參見〈上林賦〉「於是乎崇山矗矗……」一段針對山勢高峻的形容，《司馬相如集校注》（同註⁵⁶）頁44。

以第一條資料為例，與〈山居賦〉前文先是套用大賦體式，鋪陳「南術」舊宅如何「備列」山川動植，顯然有所不同，比如說到舊居附近所產之竹，先是總說至少有八種類別——「其竹則二箭殊葉，四苦齊味。水石別谷，巨細各彙」，其次，將描述重點放在所有竹類共有的姿態，所謂「既修竦而便娟，亦蕭森而蓊蔚。……捎玄雲以拂杪，臨碧潭而挺翠」；但是此處謝靈運進一步談到的則是獲取竹筍的過程，如何登上山嶺，砍伐大樹、去除灌木叢，才能找到竹林，剝取鮮嫩的竹筍。這不但是透過身體尋索定出地點，也讓這地點的出產因為需求而有了個別意義；換言之，這是由搜尋者的判斷、採集或製作來決定這名物的出現與存在。就如第二則資料以下，不但拉引出荒野與蓼、高林與野樵、巖頂與芟草以及蒨與向陽處、擲與陰溼地的關連，同時這些關連是因為可食可飲、可製紙、做染料而被呈現出來。所以最後兩則資料，就特別強調關乎製作的材料與成品的關係，包括如何塗泥作器、如何找草料、作草墊，如何製作石灰、木炭等；而如朮、檮可以作酒，不論甘、苦，「並至美，兼以療病。檮治癰核，朮治痰冷」（自注），這幾乎涵蓋了生活大小面向所需的知識技能。

當「穀稼」也納入「山川」論述中的一環，「山作水役」這一段正可以說明，所有果、木的類聚就不再只是為了引證或聯想而已，於是〈上林賦〉中明顯以描述物態為主的形容手法，在此被大量描述人身動作的動詞所取代。〈上林賦〉曰：

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棗，枇杷樛柿，檮柰厚朴，栲櫟楊梅，櫻桃蒲萄，……羅乎後宮，列乎北園，……煌煌扈扈，照耀鉅野。
沙棠櫟櫨，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長千仞，大連抱，……垂條扶疎，落英幡纒。紛溶溶蓼，猗猗從風，瀏莅鼎歛，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雜襲累輯，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⁶¹

許多果、木的名稱在這裡被列敘出來，同時輔以如「煌煌扈扈，照耀鉅野」、「紛溶溶蓼，猗猗從風」等形容，以建構這些果、木類聚的狀態。這當中所羅列的果、木其實也可食用（如橘、棗、枇杷等）、可造酒（如葡萄），或是可染色（如櫟）、可製

⁶¹ 引自《司馬相如集校注》（同註⁵⁶）頁56-57。

繩索（如并閭），但是〈上林賦〉明顯不從這角度來定位這些物類，而是以狀態描述作為訓解這些物類的方式。其中如疊字「煌煌」、「扈扈」或雙聲、疊韻字如「猗柅」、「瀏莅」，這些透過語音重疊現象發展而來的形容詞，與一般規約高、低、巨、細的形容詞有不同作用，葉舒憲先生即曾以疊字為例，認為重言並不「直接說明事物的性質或狀態」，「而只是以重疊的音節來朦朧地烘托出事物的態貌」。⁶²換言之，這些形容並不著意在劃出範圍、標示方位、精準度量或固定形態，那些散放的耀眼光彩、款擺從風的聲姿，似乎只是擁有權的模糊象徵，對於劃定身體所在的關係維度並無確實幫助。⁶³但是〈山居賦〉「山作水役」這一段，明顯以大量動詞的應用取代了形容詞，換言之，是透過身體動作來詮釋這一段名物類聚的意義。地方與物類所構成的關係圖是因為人身的登、臨、經、見或其他拔取、摘除、砍伐等動作而顯豁出來。比如，「刊」木、「伐」竹、「除」榛，是砍伐剪除的動作讓竹、木、榛呈現在眼前，而以「陟」嶺統括伐除等動作，才讓動作所在呈現出「高」度；又如「擿」擿、「掘」菑，更以挑取與挖掘這兩種尋覓動作，所透露的遠近不同的物我間距，映襯出所在地的明暗、溼燥與高低（陰標與陽崖）。

而人身動作所及、所能夠拉引出的空間體驗其實極為細密豐富，並不僅止於方位或距離，如前引「苦以朮成，甘以穡熟」，不論甘、苦，「並至美」，以及野樺的「味似菰菜而勝」，都是在「地—物」的關係間醞釀了氣味體驗的空間，亦即在上下四方的座標中增生了無法用尺度計算卻可以用身體測度的新維度。而〈山居賦〉中關於「南山」的開創，也許可以視為透過身體行動的輔助所營造的一個新地標：

南山則夾渠二田，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谷異巘。……眾流溉灌以環近，諸堤擁抑以接遠。……凌阜泛波，水往步還。還回往匝，枉渚員巘。呈美表趣，胡可勝單。

⁶² 詳見所著：《詩經的文化闡釋——中國詩歌的發生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五章〈摹聲、重言、嬰兒語——漢語的詩歌功能與中國詩的發生〉，頁356。

⁶³ 關於漢代大賦中連綿詞與狀態描摹的關係，請參見鄭毓瑜〈連類、諷誦與嗜欲體驗的傳譯——從七發的療疾效能談起〉，《清華學報》36卷第2期，2006年12月，頁399-425。

抗北頂以葺館，瞰南峰以起軒。羅曾崖於戶裏，列鏡瀾於窗前。因丹霞以頽楣，附碧雲以翠椽。……沆泉傍出，潺湲於東檐；桀壁對峙，硿礧於西雷。

在自注中，謝靈運首先對於南山這「開創卜居之處」與臨江舊宅的距離遠近提出估算——「從江樓步路，……當三里許」，並說明「塗路所經見也，則喬木茂竹，緣畛彌阜，橫波疏石，側道飛流，以為寓目之美觀」，這是沿途豐富的地景總說；而賦文中則特別由水道蜿蜒、州渚婉轉來呈現這粗估三里的路程，「環近」、「接遠」既是視線牽引，「還回往匝」亦是步履往復，顯然「呈美表趣」所勾勒出的不止於這三里，而是身目與水岸、渠流交接周旋的新路線。同樣地，說到南山葺築之高，在注文中也指出：「西巖帶林，去潭可二十丈許，葺基構宇，在巖林之中」，這個「二十丈」的上下差距，當然是為了營造俯仰的視野，所以特地「開窗對山」（自注），召喚窗外的「曾崖」、「鏡瀾」，在視窗前交融羅列如掛軸，而繚繞四周的丹霞、碧雲，更是登堂入室，讓人彷彿飛升於霞際雲端，更使這高度的體驗超越了可以估量的界限。

如果藉助《世說新語》所錄，會發現這種人身與山川交接的體驗，自東晉以來就出現不少相關記載。比如：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⁶⁴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⁶⁵

表面上看起來這兩則記載的重點在於荀羨與王胡之的清言雋語。但若是參考劉孝標注所引《南徐州記》曰：「（京口）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如果荀羨沒有「登」上突出江面、居高臨水的北固地形，便無法顧「望」滄茫，而有飄然凌雲之想；換言之，「三面臨水，高數十丈」的地形，正是通過這登高四「望」的動作被具體驗證。難怪宋人劉損在《京口記》中提及北固山，認為是「北望海口」，

⁶⁴ 引自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4年）〈言語〉篇第74則，頁135。

⁶⁵ 引自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同前註）〈言語〉篇第81則，頁138-139。

得此「壯觀」，因此北「固」宜改為「顧望之『顧』」，⁶⁶正凸顯了顧望這一個親身觀覽對於山川關係「命名」的重要性。劉注又引《吳興記》所談印渚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旁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眾溪之下流也。印渚以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船；印渚以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從這個描述重看王胡之所謂「清朗」、「開滌」，很難不與印渚所界分的水道狀況相聯繫，似乎正是設身處地得為所有糾纏盤結的陡然會通所作的經驗詮釋。而關於會稽的山川之美，更不能不提顧愷之、王子敬的親身經歷，〈言語〉篇記載：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壞」。⁶⁷

依據劉注所引《會稽郡記》，以會稽境內多名山水：「峰嶸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擢幹竦條，潭壑鏡徹，清流瀉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顯然劉宋孔靈符作此會稽記時，⁶⁸不但徵引王子敬的說法，似乎也隱括了顧愷之的體驗。這讓人注意到，即便是地志的書寫，在晉宋時期也已經將親歷經驗視為地理辨識、名物定位的一個基礎，似乎也暗示了「山川（之美）」（《世說新語》所載）與「山水（之美）」（《會稽郡記》所錄）一詞通用的原由，正在於，從名士清言、地志書寫到文學創作，以身體行動聯繫方物的趨向，的確共同推促了一個新「種類」地理的產生。

討論地理或地方的不同「種類」（kind），而不只是討論不同的「地方」（place），

⁶⁶ 劉損《京口記》曰：「（北固山）回嶺入江，懸水峻壁，舊北固作『固』字，……然北望海口，實為壯觀。以理而推，宜改為顧望之『顧』」，收錄於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頁169。原出自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卷46「北固山」項下所引，頁351。「回」字《御覽》作「迴」。

⁶⁷ 分見《世說新語》〈言語〉篇第88與91則，引自《世說新語箋疏》（同註⁶⁴），頁143、145。

⁶⁸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所收《會稽記》下注明撰者為「宋孔靈符」，考證詳見頁182。

正為了凸顯從「山川」到「山水」論述的發展，其中最大差異不單單在於指證不同的地方（如九州、上林或京口、會稽），更根本的是為了體現這時期由寓目身觀、經處親歷所營造出的新的地理類別。⁶⁹在東漢以後，記載單一地方而由私人撰寫的地志大量出現，胡寶國先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州郡地志〉一文中，曾大略將東漢至於南朝這些私人所作的地志書寫，依據時代發展區分出不同的特色：東漢魏晉時期主要是異物志，可以說是一種「博物」地理；晉宋以後增添了對於山水本身的介紹，「山水」地志大量出現；⁷⁰並認為其中晉宋至於南朝的山水地志「往往更接近於文學作品而不是地理書」。⁷¹接近文學作品是否就不是地理書，其實值得推敲；也許可以反過來說，這時期大量如同文學的地志的出現，正宣告了某一新「種類」的地理論述的產生。

從最簡單的「高、遠」體驗來說，在這些山水地志中往往如此描繪：

夷陵縣陝口山，非日夜半不見日月，多猿鳴，至清遠。⁷²

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⁷³

自西城涉黃金峭、寒泉嶺、陽都坂，峻嶒百重，絕壁萬尋。……言陟羊腸，超

⁶⁹ 關於營造不同「種類」的地方，而不只是注意「地方」差異，參考了 Neil Smith 的說法。在“Homeless/global: scaling place”一文中，Smith 認為「營造彼此有別的地方，便意謂著地理尺度的產生，而尺度與其說是地方之間的差異判準，還不如說是不同“種類”地方的差異判準」，原文見 J. Bird, B. Curtis, T. Putnam, G. Robertson, L. Tickner (eds).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pp.87-119. 中譯參考 Linda McDo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合譯《性別、認同與地方》（*Gender, Identity and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所引用 Smith 此文的說法，〈導論〉頁 5。

⁷⁰ 詳見胡寶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州郡地志〉一文，《中國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2001 年第 4 期，頁 13-25。

⁷¹ 同前註，頁 20-21。

⁷² 引自晉范汪：《荊州記》，收錄於《漢唐方志輯佚》（同註⁶⁶），頁 111。原出自《太平御覽》卷 910「猿」項下所錄，頁 4164。

⁷³ 引自東晉袁山松：《宜都記》，見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二次印刷）卷 34「江水注」，頁 2844-2845。

煙雲之際，顧看向塗，杳然有不測之險。⁷⁴

（雲南）縣西高山相連，……縣西北百數十里有山，眾山之中特高大，狀如扶風太一，鬱然高峻，與雲氣相連結，因視之不見。⁷⁵

前兩則資料中都提到猿鳴，尤其鳴聲出自重巖疊障間，在迂曲的山谷間迴盪傳響，這當然不是徑直式的遠近估量，而是在「應其聲響（響應）」的聽聞效果中，讓「遠」迴旋地體現。後兩則資料涉及山勢的「高峻」或「高險」，都使用煙雲的掩蔽的效果，強調其升霄入雲而不見端際；換言之，高聳的山「勢」其實與視覺中的雲煙聚散密切相關。如果高聳的形勢不僅僅關乎山巖的本身，渺遠的距離也不全然只是水陸的界線，所謂「高、遠」的體驗其實是山水與雲煙或鳴聲相互作用後的整片式感知，那麼，可以說，雲煙與高聳、鳴聲與迂遠在當時根本是早已聯繫成類的體驗模式。而底下二例，顯然是更擴大了山水體驗中的連類關係：

臨賀謝休縣，東山有大竹，數十圍，長數丈。有小竹生旁，皆四五圍。下有磐石，徑四五丈，極高，……兩竹屈垂，拂掃其上，……未至數十里，聞風吹此竹，如簫管之音。⁷⁶

大溪南岸有西山，名為城門。壁立，水流從門中出，高百餘丈，西流瀑布，日映風動，則灑散生雲虹，水激鏗響，清泠若絲竹。⁷⁷

前述是猿鳴在山谷間傳響，但這裡是先有風吹來，所以兩竹拂動而傳響數十里遠，顯

⁷⁴ 引自《漢中記》，見《水經注疏》（同前註）卷 27「沔水注」，頁 2327。

⁷⁵ 引自晉魏完《南中記》，收錄於《漢唐方志輯佚》（同註⁶⁶），頁 148。原出自《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卷 23〈郡國志〉，頁 3514。

⁷⁶ 引自宋盛弘之的《荊州記》，收錄於《漢唐方志輯佚》（同註⁶⁶），頁 215-216。原文可見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京都：中文出版社，1980 年）卷 89「竹」項下所錄，頁 1552，與此處引文略有不同，如「臨賀謝休縣」，作「臨賀冬山中」，「極高」作「極方正」等。

⁷⁷ 引自宋鄭緝之：《永嘉記》，收錄於《漢唐方志輯佚》（同註⁶⁶），頁 192。原出自宋樂史：《太平寰宇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 年）卷 99「白龍縣」項下所錄，頁 745。

然迴響的生發，不只是猿鳴或竹拂，也拉引出氣流所形成的風動；同樣的，與「高度」相關的體驗，也不只是來自雲霧，第二則資料由高處流下的瀑布寫起，既透過懸墜而下的鏗鏘水聲補充了視覺上的「高百餘丈」，又加上「日映風動」的聲光雙重效果，在水花中揮灑出雲霓虹影。顯然，高山、日月、煙雲、虹彩這一系列比較偏向視覺或高聳的體驗，與水谷、竹風、猿鳴、飛瀑這一類偏屬於聽覺或迂遠的體驗，在類與類之間已經有了非常細膩的交涉迎應，所以我們還可以看到如「風泉傳響於清林之下，岩猿流聲於白雲之上」⁷⁸的描述，「風」與「泉」複合成語詞，同時因為傳響而顯豁出山林系列的背景，「岩」與「猿」也複合成詞，當然也不忘透過流聲迴盪雲霄，而照會曠遠的穹蒼。

當如此不同於訓解徵引、朦朧烘托或丈量計數、精審校驗的敘記方式，大量出現在晉宋時期的地志書寫中，當山野、林木、水石、猿鳴、竹風這些不同於九州、京都、苑囿、貢賦等的名物類項，以交錯跨類（包括視、聽覺或高、遠度等等）的模式重構地景，這無疑是被認為在東晉興起的「山水詩」或「山水文學」與先秦以來所謂「山川」論述最重要的發展分界，也可以說是「山川」論述轉化為「山水」論述最重要的核心關鍵——就在於這套新的名物連類方式的形成。

四、結語：在持續建構中的「名物連類」

東晉袁山松作《宜都記》，其中有一段關於西陵峽的親身體驗，這樣說到：

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其臺岬秀峰，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敘。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于

⁷⁸ 引自宋盛弘之的《荊州記》，收錄於《漢唐方志輯佚》（同註⁶⁶），頁214。原出自《水經注疏》（同註⁷⁶）卷32「沮水注」，頁2698。

千古矣！⁷⁹

如果僅是將這則資料視為江南景觀對於時人山水美感的發引，似乎會忽略資料中所透露的三個向度，其一，這則資料出現在地志書寫中，魏晉宋齊間這類地記之書蔚然興盛，如晉摯虞作《畿服經》一百七十卷，齊時陸澄匯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作《地理書》，任昉於陸澄所輯又增八十四家，為兩百五十二卷的《地記》，其餘沒有著錄在陸、任二書中而為《隋書》所錄者，猶有數十種，〈經籍志〉總說這類書寫是上承《尚書》〈禹貢〉、《周禮》〈地官〉乃至於史籍中的〈河渠書〉〈地理志〉的系列，⁸⁰顯然這類地記的書寫有一個比所謂「文學」更大的背景，必須放回「地理」論述的傳統中才能看出發展的軌跡。其二，袁山松特別說到他的書寫不同於「書記及口傳」，這讓人想起尤其為漢晉大賦所模擬的那種引證圖籍、訓解名物或考校舊俗的敘記方式，袁山松的「踐躋此境」、「目所履歷」顯然有所不同。其三，《宜都記》的書寫雖異於訓解引證，卻不即等同於如裴秀考校面積、方位、遠近、高下、曲直，所圖畫出來的可以「依據」的、「精審」的山川土地。上引資料中，像是猿鳴至清，泠泠傳響，或是蕭森林木，彷彿出於雲霞之表，這些高遠的體驗，顯然不是為了佐證丈量計數的精準，而是本身就成為地理高、遠度的「體現」，更不用說親見欣然、俯仰流連，似乎一個前所未見的新天地就在身所躋踐、目所履歷間具體綿延開來。

如果對照〈山居賦〉中所說的「此焉卜寢，翫水弄石。邇即回眺，終歲罔斲」、「仰眺曾峰，俯鏡濬壑，……北倚近峰，南眺遠嶺，……水石林竹之美，岩岫隈曲之好，備盡之矣」（自注），或者出現在〈登江中孤嶼〉詩中的「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這些與袁山松口吻一致的稱賞或歎美，很難不讓人聯想到，同樣奠基於名物類聚系統的〈山居賦〉，其實也是這個地理書寫轉向下的代表作品。選擇這個地理書寫的角度重看〈山居賦〉，首先，因此可以理解謝靈運偏愛使用「山川」一詞的原由，正在於「山居」的書寫是奠基於山川名物的類聚模式，方便地挪借了擁有權的象徵性；進一步也可以說謝靈運同時正是在定位自己的書寫並不只是「居處」所有版圖的宣示，

⁷⁹ 引自《水經注疏》（同註⁷⁸）卷34所引，頁2844-2845。

⁸⁰ 詳見魏徵等：《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33〈經籍志〉，頁982-988。

而是將〈山居〉納入地理書寫系統的發展中。於是，當謝靈運參與東晉以來興盛的一種透過身體行動的地理發現（窮究歷覽），他同時也改造了原有的名物訓解系統，不論是強調八方殊異的山川形勢，以及由物與物之間的動態關係，來取代原有普遍物性的展示；或是以親歷身觀的體驗空間，取代可以精審估算的數據圖譜，在中國文學史上被目為「山水詩」大家的謝靈運，其實更是「新地理」論述的營造者之一。最後，從名物連類的角度進行山水文學的研究，也許更能在謝靈運的個人才分、玄學思潮與江南環境這些分散的因素之外，提出一個同時可以整合傳統與當代地理論述的核心模式；並且具體呈現，所謂「山川」或「山水」風貌在不同時代的提出，根本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套名物連類系統，舉凡政治權力（出處朝野）的象徵、思想觀念（莊老或佛道）的隱喻或是文學美感（巧構形似）的發引，都可以說是在這套已經被熟悉、認可的名物詮解中反覆被敷演與重新建構出來。

（本文原以英文稿 Bodily Movement and Geographic Categories: Xie Lingyun's "Rhapsody on Mountain Dwelling" and the Jin-Song Discourse on Mountains and Rivers 登載於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vol. 23, 1-4, 2007, pp.193-219。此中文稿又增補部份內容）

主要參考及引用文獻

一、古代典籍

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屈原等著，王逸章句：《楚辭章句》，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

司馬相如著，金國永校注：《司馬相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范曄著：《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

陳壽著：《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

房玄齡等著：《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沈約：《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4 年。
- 謝靈運著，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 年。
- 蕭統編，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 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4 年。
- 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年。
- 魏徵等：《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 劉緯毅編：《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年。
- 歐陽詢編：《藝文類聚》，京都：中文出版社，1980 年。
- 樂史：《太平寰宇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 年。
- 李昉等編：《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

二、現代中西論著專書

- 鄭毓瑜：《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0 年。
-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01 年。
- 蕭馳：《佛法與詩境》，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 唐長孺：《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的發展》，臺北：帛書出版社，未著出版年。
- Jon Bird, Barry Curtis, Tim Putnam, George Robertson, and Lisa Tickner, eds.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1993.

三、單篇論文

- 唐長孺：〈南朝的屯、邸、別墅及山澤佔領〉，《歷史研究》1954 年第 3 期，北京：中國科學院，1954 年。
- 胡寶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州郡地志〉，《中國史研究》2001 年第 4 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2001 年。
- 鄭毓瑜：〈連類、諷誦與嗜欲體驗的傳譯——從七發的療疾效能談起〉，《清華學報》36 卷第 2 期，2006 年。

Bodily Movement and Geographic Categories: Xie Lingyun's "Rhapsody on Mountain Dwelling" and the Jin-Song Discourse on Mountains and Rivers

Cheng, Yü-yü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While studies of Chinese landscape literature usually focus on landscape poetry (*shanshui shi* 山水詩), I wish to take Xie Lingyun's "Rhapsody on Mountain Dwelling" as my point of departure to discuss how the rhapsody draws from the categorization of geographic designations and local products (*mingwu leiju* 名物類聚) at work in traditional geographical texts such the "Yu Gong 禹貢 [Tribute to Yu]" chapter in *Shangshu* 尚書 and the "Diguan 地官 [Regional Offices]" chapter in *Zhouli* 周禮. More broadly, I discuss how "landscape literature" participated in contemporaneous writings on geography. Xie was part of an Eastern Jin discovery of the landscape that engaged it through bodily movement. This new embodied mode of experience altered the system of naming and explicating the terms

of landscape. Xie Lingyun, hailed as the great “landscape poet” of Chinese literature, might be better described as someone who helped construct a new geographical discourse.

Keywords: Xie Lingyun, Rhapsody on Mountain Dwelling, *shanchuan*, *shanshui*, bodily movement, geographic categories